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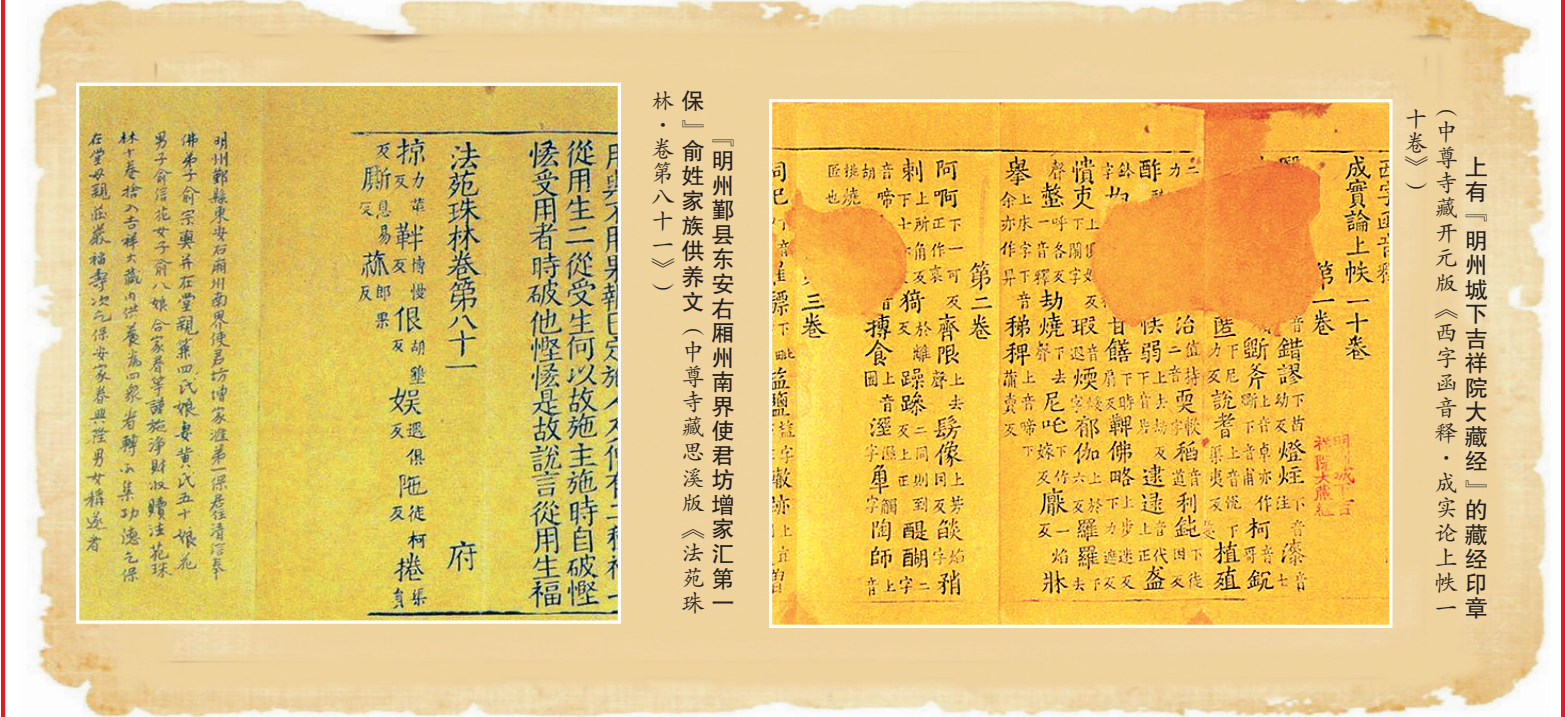
“州”“县”“厢”“界”“坊”“保”——
从新发现的史料
看宋代明州城厢结构

李广志

近日,笔者在解读一份日藏宁波文献时,发现一页思溪版《法苑珠林》的侧面写有“明州鄞县东安右厢州南界使君坊增家汇第一保”的地名及相关人名。该史料属于日本中尊寺藏宋版《大藏经》的一部分,原为明州吉祥院所藏。

资料中记载的明州鄞县城厢地名极为罕见,笔者查遍宁波地方史志,未见有相同记载。此前,日本学者介绍过该经的存在,但只是摘取其中“人吉祥大藏内”一句话,证明它来自宋代明州吉祥院而已,未对该文其他部分进行摘录和解释。

保存该经文的中尊寺,位于日本东北部(今岩手县),那里曾兴起过一段灿烂的佛教文化。中尊寺所在的平泉町,繁盛于12世纪,是日本最早有计划建造的地方都市。中尊寺及其他佛教遗址至今仍被很好保存,寺



宋代基层行政组织,常见的是乡村设乡(管、都)、里(保),城郭设厢、坊。宋承唐制,“百户为里,五里为乡,四家为邻,四邻为保。在城邑为坊,田野为村”(《宝庆四明志》郡志卷第三)。但是,存世文献的记载往往与传统认识不相吻合。两宋期间,明州地区发展迅速,人口增加,城市化加快,因此有些文献记载落后于现实状况。例如,《宝庆四明志》所载的明州鄞县乡村中:“武康乡在府城下,管小江里;东安乡在府城下,管白垭里。”

而到了南宋后期,武康、东安两乡纳入城郭中官属的楼店务地,且属上等用地,《开庆四明续志》卷七“楼店务地”条载:“第一等地。上则东安乡:自府前街两岸,取四明桥,自能仁寺前市廊西街北岸,至贯前巷口;自贯前巷口市廊南北岸,止永济桥。上则武康乡:自能仁寺巷口、市廊,取东渡门南北岸,及自税务桥、阿满门首,取团内归西,止团桥林保门前,住并灵桥门,直取宋端仁旧食店,今施崇住;及自车桥北巷口入两岸,取郑允客店,今吴献可住。”东安、武康两乡从城郭“州府”或“市廊”前延伸

至于吉祥院所藏宋版《大藏经》传入平泉的时间,从开元寺版印刷的年代以及思溪版的《法苑珠林》供养文中的“绍兴十四年八月中秋日”等方面推测,应该是在12世纪中期至末期。

宋代刻印的《大藏经》,又称《一切经》,是将由印度和西域传译到中国的大小乘经、律、论及贤圣集传汇编而成的一大丛书。北宋初期出现佛经木刻本。两宋期间,日本把这些宋代印刷的《大藏经》称作宋版《一切经》。

宋版《大藏经》共有五种版本,其一:蜀版《开宝藏》,又称开宝《大藏经》。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四年(971年)敕高品、张从信到益州(成都)开始雕刻《大藏经》,至太平兴国八年癸未(983年)竣工,这是汉文《大藏经》中最早雕版和印刷的。其二:福州东禅寺等院版,又称福州本、闽本、越本,赐名《崇宁万寿藏》,刻于北宋元丰三年(1080年)福州(闽州)东禅寺等院版。其三:福州开元寺版,又称福州藏、毗卢藏。始于徽宗政和二年(1112年),大约持续至绍兴二十四年(1154年)。其四:湖州思溪圆觉禅院版,又称思溪版、思溪藏、浙本。宋绍兴二年壬子(1132年),在浙江湖州思溪圆觉禅院,由沙门宗鉴、净梵、怀琛、王从永与弟侄及眷属等募雕的。其五:平江府赧砂延圣院版,又作延圣寺版、赧砂藏。南宋绍定(1228年-1233年)初年,赵定国等受思溪版影响而发起开雕,后持续至元代。宋版《大藏经》除蜀版为官版外,其余四种皆为民间私版。日本中尊寺藏的明州吉祥院《大藏经》,一个是开元版,另一个是思溪版。

明州吉祥院的《大藏经》传播到平泉中尊寺,并成为中尊寺的佛教圣典,这不仅说明12世纪宁波佛教繁荣和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发达状况,经文页面上所记载的明州城厢及人物信息,也见证了宁波城市变迁的历史,为宋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。

那么,这个“明州鄞县东安右厢州南界使君坊增家汇第一保”之地,究竟相当于现在什么地方呢?水银先生认为,根据《敬止录》(三)所载“庆元府城内大小二

王 一 明 (1926 年—2004 年), 宁波东乡大碶杨家桥村(今北仑区大碶街道王隘村)人。曾用王铁珊、王一鸣、王曰叟等笔名在宁波报刊上发表诸多副刊文章,后来在上海从事越剧编剧和导演时,用得最多的笔名是王曰叟。曰叟,源自《孟子见梁惠王》:“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:叟!……”

王一明的祖上以制作和经营锡箔为业,家境殷实,在村里建有独栋大宅。王一明的幼年 and 童年就是在那座大屋里,和没认识几个字的小脚母亲一起度过的。11岁时随父母去上海。其时,宁波大碶乡间多有人在上海经商,王一明的阿姑一家在上海开店做老板,所以他家在上海也有落脚点。其父之后就跟随同村人一起上了外国商船,在一艘货轮上做厨师。王一明在上海先后读完小学和中学,读书期间,他广泛地接触各种艺术表演。他在《看戏看热闹》一文中写道:“这几年我看戏看电影极多。”“吸引我去看的是报纸上的广告。广告不是干巴巴而是形象生动的噱头、特技和机关布景等等。”当时的大上海是中国时代风潮的最前沿,也是各种戏曲表演特别是越剧的艺术中心。

1945年7月,王一明在隆隆的轰炸声中离开上海回到家乡。8月底,在老家的小学里找到一个教书职位,开始了人生的新阶段。教书之余,王一明读一些进步书籍和学校订的报纸,如《镇海报》《宁波时事公报》《上海《文汇报》等。渐渐地,他的思想变得开明起来。同时,也激发了他的写作冲动,开始动手写一些文章寄给报社。处女作《或者恐怕未见得》是一篇向宿命主义者挑战的檄文,是抨击封建迷信、星相巫术之类的乡风民俗的,寄给报社后很快就发表了。之后,他埋首报章,潜心读写。乡间学校的清静,正好给了他闷头努力的环境。他那时的文章多是直抒胸臆,有感而发,内容多针砭时政,弃恶扬善。

不久后,报纸副刊的篇幅限制使得王一明不甚满意,开始转向戏曲创作。同时,他以敏感的社会和政治意识,关注国家命运,关注时政,用戏曲表达自己的政治热情。从“抗租”“支前”,再到“大生产”,一些重大题材出现在他的作品中。《大生产》是王一明在1950年1月即兴写就的一部越剧小戏,初衷是应征报社为宁波春节戏剧竞赛创作的,结果报纸只发表了他的《大生产》。到了春节期间,职业剧团都加演该剧,各地农村剧团也纷纷演出。

《大生产》毕竟只是一部越剧小戏,王一明的心中还有更高的艺术追求,他开始了下一个新剧创作。1950年10月23日,宁波当时家喻户晓的佩卿剧团在天然舞台演出了由王一明编导的《鞭声泪痕》。八幕七景的《鞭声泪痕》是一部“红色”剧作,与当时的时代紧密相合。故事中,“妻子中毒计,丈夫扶血鞭,虎口欲脱离,魂归离恨天”。主题突出,爱憎分明,并且以情动人,格外有艺术的说服力。当时宁波的戏曲演艺仍以“路头戏”为主,而《鞭声泪痕》则是创作剧,被誉为“典型创作”,王一明一炮走红。

随着声誉日隆,王一明全力投身戏剧舞台。那时的他,既讲“路头戏”,也自己写剧本,两种形式并存。但很显然,他更倾向于剧本创作,已经预料到“路头戏”即将走下坡路。同时在剧本创作中,更倾向于“新剧”,也即剧本体现时代意识和革命精神。这两个“倾向”,可以从当时王一明编导的作品中看出端倪。如为“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五周年”编导的“六幕反封建大悲剧”《祥林嫂》;为“迎接国庆”导演的“华东地区最新两大杰作”《父子争先》和《玉面狼》;五幕七景古装史剧《浙东义士》等。

崭露头角的王一明,矢志要在戏剧表演的舞台上展示人生。1953年夏,王一明躲在佩卿剧团为他找的一个位于江厦街渔行楼上的住处,开始通读《聊斋志异》。这是他的一次分量极重的创作。在后来的回忆中,他说:“我自知《红楼梦》

在之后的12年里,有38部作品被他推上舞台。年轻的他精力充沛,思维活跃,对舞台构思往往有其独到之处,在布景、灯光、演员上下场、音乐节奏、机关设置上,总会有一些出新的手段。也因此,王一明受到沪上各大剧团的青睐,不仅先后签约文华、和平、少壮等著名剧团,还经常为把一台戏搬上舞台而临时受聘于其他剧团。同时,他的艺术触角还伸展到其他戏剧剧种,如为沪剧团导过沪剧传统戏《渔缸计》、为锡剧团导过《避火珠》等。另外还有话剧本、淮剧本、京剧本等问世。值得一提的是,王一明编导的剧目中,革命现代戏占了很大比重,如《摇篮曲》《金沙江畔》《山乡风云》《红色灯标》《带枪的女理发师》等。

从宁波到上海,从初创到日臻成熟再到艺术上的自如,在王一明的心里,始终有一条红色的线索贯穿着。



《鞭声泪痕》《白鲤鱼嫁郎记》戏单



王 一 明 20 世纪 50 年代摄于上海

越剧编导名家王一鸣
在宁波的早期红色创作

石 家 明

等名著早被前辈编剧们捞光,轮不到我了,我就从宁波市戏曲改进协会主席包华的书房里借来《聊斋志异》,赤膊睡在草席上通读全部故事430则。随读随记,从初中选21则,读毕不再开卷,只将21则逐一评比作出取舍。最后选定三则:《白秋练》《珊瑚》《胡四娘》,并首选鲤鱼精白秋练布局写戏。戏成,自己导演。报纸海报的广告名为‘聊斋神话越剧《白鲤鱼郎记》’。演出一炮打响,新甬剧场平时一剧演七八个夜场,此剧首演即连演21场,不但大大突破了剧场剧团一剧连演的最高纪录,并且突破宁波市七家剧场的历史记录……两年后,我将此剧改名为《白鲤记》,先后搬上苏州、上海两市舞台,同样轰动……后来听同行朋友议论,此剧苏浙皖闽都在演出,演出的剧团有40多家……”

1954年,王一明带着他的手稿《白鲤鱼郎记》到了上海,很快,他在上海开创了自己艺术生涯的全新局面。他观摩、学习、临仿,将别人的艺术创新融入自己的艺术思想中。

在之后的12年里,有38部作品被他推上舞台。年轻的他精力充沛,思维活跃,对舞台构思往往有其独到之处,在布景、灯光、演员上下场、音乐节奏、机关设置上,总会有一些出新的手段。也因此,王一明受到沪上各大剧团的青睐,不仅先后签约文华、和平、少壮等著名剧团,还经常为把一台戏搬上舞台而临时受聘于其他剧团。同时,他的艺术触角还伸展到其他戏剧剧种,如为沪剧团导过沪剧传统戏《渔缸计》、为锡剧团导过《避火珠》等。另外还有话剧本、淮剧本、京剧本等问世。值得一提的是,王一明编导的剧目中,革命现代戏占了很大比重,如《摇篮曲》《金沙江畔》《山乡风云》《红色灯标》《带枪的女理发师》等。

从宁波到上海,从初创到日臻成熟再到艺术上的自如,在王一明的心里,始终有一条红色的线索贯穿着。

组织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证据。另外,史料中记载的“使君坊增家汇第一保”的俞宗爽一族,为研究宁波地区俞氏家族的历史提供了新材料。

关于明州吉祥院,《宝庆四明志》有记载:“鄞县东南一里一百步,晋天福五年建,六年以释天院为名。皇朝太平兴国八年,改赐今额。嘉定十三年,火,重建。常住见置。”

近年整理的《宁波佛教志》显示,吉祥院大约位于今天宁波海曙区狮子街吉庆巷附近,始建于五代后晋天福五年(940年),初名释天院,北宋太平兴国八年(983年),赐额“吉祥寺”。南宋嘉定十三年(1220年)毁于火,重建后至元朝至元年间(1264年-1294年)又三度毁于火灾。

其实,关于吉祥院、吉祥寺的位置,《宝庆四明志》中的几处记载不一致,且差异很大,一是在“鄞县东南一里一百步”,一是在“距府(今鼓楼)二里二十步”附近。故推测吉祥院(寺)的位置可能在嘉定十三年(1220年)后有变动。宁波地方文史专家水银先生认为,其地理位置,前者在今药行街北侧天一广场一带,后者在今狮子街一带。

湖丈尺图”(1220年-1221年)显示,月湖东侧有“曾家汇”“史君坊”的地名,处于西南隅,这与《大藏经》中供养文的“使君坊增家汇”及“州南界”吻合。至于“使”与“史”“增”与“曾”的文字之别,概为某一方写的错字或别字。他推测,“东安右厢州南界使君坊增家汇第一保”的位置,应该是今海曙区月湖以东的区域。

这一供养文所记载的时间为南宋绍兴十四年(1144年)八月中秋日,用楷体墨书写在《法苑珠林》刻板印刷的留白处。文中详细记载了“明州鄞县”俞姓家族成员捐献吉祥院供养的始末,内容详尽,史料价值极高。文中显示的鄞县城厢地名及人名,为历代史志所不见。它所反映的内容,对于解读鄞县宋代社会结构、城乡组织、宗族社会、佛教信仰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更有趣的是,“花男子”“花女子”这种修饰语或词汇,笔者未见于其他文史资料记载,体现宁波地区使用语言的一个特征。

(作者系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)

